



曹晓昕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七建筑工作室（器空间）主任、主持建筑师



钟兵
AECOM中国区建筑设计执行董事



岳子清
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



宋微建
上海微建（Vjian）建筑空间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设计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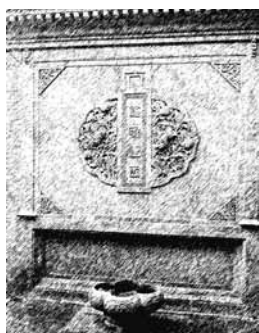
唐艳红
ECOLAND易兰副总裁



杨庆琦
这方建筑师事务所合伙人



赵仲贵
这方建筑师事务所合伙人



“中国式栖居” 专家观点碰撞

Architect's Opinions about Chinese-style Dwelling

曹晓昕：我的“心中式”就是“新中式”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新中式”成为了热门话题。而对中国传统形式的挖掘和应用，中国几代建筑师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努力是失败的，对中国传统式样进行翻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有时候我也在问自己：寻找新中式的道路是不是陷入了误区，我们是不是在骑驴找驴呢？对于我这样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被中国文化浸润的新一代建筑师，我认为我的“心中式”就是“新中式”，因为在我身上中国式的价值观在设计上是自然而然地流露的，藏也藏不住。我也不认为中式传统建筑在形式上的简化和改良就是所谓的“新中式”，我更看重的是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诉求。举个例子，中国园林讲究小中见大，人景互动，建筑和景观需要人参与，而现在的政府大楼本来应是弘扬中国文化的，却成了反文化，大广场和大草皮已经算是大中见小了，有的甚至连树都没有，就更别提参与互动了，所以你如果再搞斗拱大屋顶那都是反中式的和伪中式的！



北京玉渊潭酒吧一条街



珠海云山诗意



岳子清：居住的“中式表达”在建筑师眼中可能很重要，但在住宅商品层面往往只是一个标签

居住设计最直接表现为与生活方式的互动。处在特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环境之中，无论自觉与否，中国的建筑师在设计中不免流露一定的“中国性”。而主动地从传统建筑形式，尤其是从零星和非典型的历史遗存中提取和再造“中国式栖居”意象的行为，则属于一部分设计师的追求。城市设计应该关心社区、环境、公共空间等大众民生问题，而夹杂文人情怀的“中国式栖居”往往追求内向和自省。居住的“中式表达”在建筑师眼中可能很重要，但在住宅商品层面往往只是一个标签，社会影响力有限。

从上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提倡的民族“固有之形式”到上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十大工程，中式建筑得到了官方的推动，中国几代建筑师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实践。但现在的问题是，城市决策者在面对城市形象问题时，早已跨过了“中而新”的思维，一致选择宏大、奇异的先锋建筑作为城市名片，“中国式栖居”则只是作为一种有潜力的商业开发模式被利用。对建筑师而言，“中式”实践带来手法的丰富，也推动意义的延伸。

钟兵：“中国式栖居”应在全球化语境下进行本土思考

建筑设计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我称之为“此时此地”的设计。今日中国处在狂飙突进式的建造时代，冷静思考仿佛成了一种“奢望”。思考产生价值，以本土文化为根基做一些尝试是建筑师创作所需的“文化自觉”。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多元共生”才更具生命力。“中国式栖居”并非形式上的模仿与拼贴，而是精神与审美需求的提升，是对中国人居住心理的回应与情趣的再造。这需要建筑师的体验与提炼，比如建筑与场地的契合所表达的“寄情山水”的自然观，对内院空间的偏爱所表现的“内敛”的精神气质，“白墙深檐”的形式所表露的对光影及层次的追求。凡此种种，这种被物化空间所表达的内在境界是我们应该解读和表现的，我们的设计需要以更多的人文关怀表达我们对使用者的尊重与期许，进而影响社会的审美与价值取向。我们的设计应让我们在全球化的网络格局中，建立一个以文化与地域为坐标的定位。根在这里，设计便也在哪里。



中海大山地别墅



北京雁栖湖凯宾斯基国际会都

唐艳红：“新中式”应具有当代性，应为居住者带来幸福感

由于中国地域的差异性、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居住习惯的多样性，我们无法衡量北方街巷院落和南方徽派建筑的优劣，只能判别其栖居环境是否可以给居住者带来幸福感。幸福感源于两个方面，其一为精神世界所带来的幸福感，其二为外界环境给予个体的幸福感，而这两者间也会相互产生影响。作为设计者，我们希望通过设计的方式给予栖居人居住环境的变化，从而为其带来幸福感。

“新中式”是当下设计界中炙手可热的一种设计风格，探讨多而成功的案例少，如何在继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满足服务现代的功能，探索现代审美的构图布局、材料选择和文化诉求，是设计的关键点。我们在2010上海世博中国园“亩中山水”项目正是很好地践行了这一原则，也因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项目在设计中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将其定位于开放式，并运用了许多传统的借景、对景、框景等景观设计方式，在当代中式景观营造过程中，始终坚持竖向设计，廊架、竹林和假山石块、高差等造园要素都被作为布局元素，用现代材料营造出了富有现代气息的景观空间。



通州京杭大运河景观



亩中山水-竹林七贤椅



亩中山水-叠山理水



北京1949盈科中心商务会所



龙湾别墅

杨庆琦：在“一连串人和空间的关系”中体现中式文化的“生活价值观”

中国式栖居和其他形式的差异来自空间的本质所产生的差异，这空间的本质用在处理人作为主体的一连串的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而这层关系受到建筑由内而外，从室内空间到建筑外部形式界面并延伸至庭院乃至院墙以及外部街道的相互影响，在这“一连串人和空间的关系”中体现了中式文化的“生活价值观”，这便是我们所认知的中国式栖居。

在这一连串的关系上恣意截取一段来发展是无法体现中国式栖居的全貌的。现在中国迅猛的城市发展下所产生的大部分集合居住模式都是在快速解决基本居住需求，无暇触及“生活价值观”这个议题，只有在某些经济条件稍好的区域市场上，建设步伐才开始放缓，开发商开始販售中国式栖居的“概念”，这便是前面提到的对于一系列关系的片段的截取，而截取的也多半是建筑立面以及景观园林的形式，多半以符号的形式出现，因为现实条件中已经没有“空间”作为操作的资源。这种“概念”的販售，其实是在消费大众的一种“乡愁”，一种在社会快速变迁中所产生的对自我、环境、社群、文化的认同所产生的疏离感。而乡愁毕竟是乡愁，由符号还原的“概念”是无法作为纯粹解读空间的读本的，是经济和市场的行为。我们寻求的还是必须具有这“一连串人和空间的关系”的，从中解读它所阐释的“生活价值观”。

赵仲贵：中国式栖居应该是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关

栖居指人的生活状态。在中国的传统建筑里，穷人的房子是比较开放的，比如干阑式等一些民居建筑；而有钱人的房子是非常内向封闭的，从古时士大夫在其中吟诗作画的中式园林到徽州高墙深宅、北京四合院和山西大院，社会动乱导致的对外人的不信任和对资源的占有欲也许是主要的原因。空间的防御性和建筑空间的秩序成为中式栖居的一个重要特征，院子围墙越高代表里面居住的人地位越尊贵。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住在独栋别墅的人想方设法要把自己的院子通过围墙或者通过加建围起来。

我们国民院子这个项目在建筑形式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中式符号，反倒是用了高挑的落地窗和非对称的布局。建筑设计突出“墙”的语汇，产生的这种防御性氛围却给了人中式的感觉。



江西婺源婺里酒店



江苏金沙湾乡村俱乐部会所



大连国民院子

宋微建：以中国的哲学观、世界观、宇宙观来做的建筑才是真正之中而新的建筑

中西建筑的不同是由不同的文化和世界观决定的。形式是思想的外化，设计不应是从形式到形式，应该是从形而上到形而下。西方人的建筑会有一种造“通天塔”的情结，他们觉得我要和上帝接近我就要建得很高，而我们中国的天坛，你看皇帝和上天是怎样对话的，只是站在三层圆台的寰丘之上，可以说中国人是比较善于用形而上的思维，所以会产生苏州园林那种把天地自然山水浓缩在自己的庭园里的意象空间。

我们的园林讲究步移景换，“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和西方那种一览无余式的几何式的园林完全不同，需要近距离深入地观赏和体验，精神内涵非常丰富，趣味无穷。有时我想如果把苏州园林那些形式的东西去掉，是不是还可以做成可望、可居、可游玩的非常有意思的空间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种方式 and 关系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但是对于那种用打散重构的方式来重新设计的方法我是不太赞成的，因为用西方的方式是无法解读东方的东西的，就像从讲求实证的西医学的角度来看中医就像巫医。

我们中国的古代建筑发展脉络一直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到了近现代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丢失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对比性的研究往往只停留在文化层面，从实践层面上探讨的比较少。例如，苏州园林也是非常舒适的，我们聪明的先人用了很多巧妙的设计，例如在园林中会有一条备弄，是仆人走的，很窄，阳光基本照射不到底，还有一种很小的天井叫蟹眼井，非常阴凉，都是利用空气温差来拔风，改善局部的小环境。还有怎样使园林里的水不会发臭，有的是下面埋了井，实际上跟外部的水保持联通。工匠们说水也分阴阳，水榭下面的水就是阴的，其实就是阳光照射的地方的水温度升高，和照不到的地方的水交换流动，池水就变成活水了。

因此，不要标签式的，一切应回归到环境、材料、人的需求上，就根据这些要素来设计，把形式放下，从人的感受上来体会那些形式形成的原因，例如舒适感不仅仅在于视觉，还有很多不易被发现的因素，比如空气的流通。以中国的哲学观、世界观、宇宙观来做的建筑才是真正之中而新的建筑。中国的建筑只有立足于自身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才能屹立于世界建筑之林。 



吴地人家红楼主题餐厅



苏州福马桃花坞